

地名學研究

第一集

辽宁省地名委员会
辽宁省地名学研究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53
0
s1

地 名 学 研 究
Dimingxue Yanjiu

第 一 集

邱洪章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字数195,000 开本: 850×1168¹/₃₂ 印张: 7¹¹/₁₆
印数: 1—10,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庆镇

封面设计: 黄正寿

责任校对: 陈志健

统一书号: 12090·11 (委托出版) 定价: 0.94元

目 录

序·····	刘诗崱	(1)
谭其骧论地名学·····	邹逸麟	(3)
谈谈中国地名的起源和演变·····	熊树梅	(8)
试论地名学的对象和任务·····	孟钧照	(25)
马克思主义和地名学的理论建设·····	陈仲雍	(32)
地名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刘盛佳	(45)
满语地名翻译中的几个问题·····	穆晔骏	(57)
论地名的语种·····	羌若麟	(65)
地名标准化与汉语规范化·····	金锡春 张明杰	(72)
怎样给地名下定义·····	陈根良	(83)
探索辽宁古今县名命名规律·····	薛作标	(88)
汉代安市县城与高句丽安市城非一地考·····	阎万章	(108)
辽宁省名称之考源与辨义·····	刘 发	(115)
最早记录沈阳的碑刻·····	沈长吉 王明崎	(124)
锦州名称考略·····	蔡迪申	(132)
金县历代县名概述·····	王立寅	(138)
岫岩名称考·····	曲 杲	(144)
新宾满语地名的特点及释意·····	刘庆华	(148)
开原境内辽东边墙的初步考察·····	姜应贵	(156)
明代鸭绿关及其附近边墙的变迁·····	曹德全	(169)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中地名考略·····	李凤舞 李 林	(174)
中国地名工作的主要内容与成就·····	王际桐	(199)
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	史念海	(211)
做好地名工作 开展学术研究·····	曾世英	(221)
做好地名管理工作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杨光浴	(228)
地名档案建设是地名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	启 明	(235)
编后·····		(241)

序

《地名学研究》是辽宁省地名委员会、辽宁省地名学研究会精选省内有关地名学的部分学术论文，并选择省外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文章编辑而成的。所收文章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地名学理论的探讨，辽宁一些地名的考证，地名管理工作的论述。此类文集的出版，在辽宁省还是第一次。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宁省近年来地名学研究的水平和深度，是我省地名学界辛勤拓荒的第一批果实。

目前国内有关地名学的专著很少。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我省地名学研究的现状，窥见国内地名学研究的动态，对这门学科的基本理论、起源与发展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读者还可以从书中一些地名考证文章得到有关地理、历史、语言等学科的知识。

地名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一般认为，它研究地名的起源、词义、演变、转译、命名时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或原因等，或者说它是综合地研究地名源流、分布情况、演变规律及其应用的学科，与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有密切的联系。

现代地名学的产生是比较晚近的事，但其历史渊源却相当久远。我国有极为悠久的地名研究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地名命名原则，并为后世所广泛使用。我国古籍中，又储存着极为丰富的地名学史料，如《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四千五百余处地名，并对其中四十余处地名的来源作了解释，《水经注》对地名来源加以解释的达两千三百余处，还有《读史方輿纪要》、《二十五史补编》等，都是重要

的地名学资料。

地名工作与内政、外交、国防、国民经济各部门，如民政、公安、城乡建设、交通、邮电、文教、科研、新闻、出版、测绘乃至人民生活等方面都有着密切联系，具有政治性强，政策性强，科学性强，综合性强，地方性强等特点。开展广泛、深入、坚实的地名学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搞好地名工作。

中国地名委员会及其在各地的相应机构成立之后，随着全国大规模地名普查工作的开展，地名工作迅速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注意，地名学也出现在我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园地之中。希望这本《地名学研究》论文集能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并引起更多的人对地名学的研究兴趣。

刘诗楠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谭其骧论地名学

邹逸麟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是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开创者之一。

谭其骧先生，字季龙，浙江嘉兴人。1911年2月25日生。

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词义及其演变的学科。因而它必需研究地名命名时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包括语言、民族诸方面的因素。这正好与历史地理学有许多相同的方面。近年来有人把地名学看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可以说是很恰当的。

地名学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第一部具有地名学研究内容的著作是《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在此书记载的四千多处地名中，就曾对其中四十余处作了渊源的介释。谭先生研究历史地理学并兼及地名学的研究就是从治《汉志》开始的，三十年代发表的《新莽职方考》就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沿革地理兼地名学的著作。王莽篡汉改制，对全国大多数地名往往用音义相同或近似或相反的字眼来改易其名，这反映了社会政治动荡和地名学的关系。先生对此作了详尽的考订，填补了两汉之际地名沿革的空白，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以后被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另一篇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虽以论述人口民族迁徙为主，同时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地名迁徙。例如他指出今安徽长江以南的当涂县，西晋时原在今淮河沿岸怀远县附近；繁昌县原在今河南临颖县地。湖北省长江以南的松滋县，西晋时原在今安徽霍丘县地。这三县都是东晋时中

原人口南迁后以原居地的地名侨立于此，一至沿袭至今。这不仅为我们指出了当时北方人民南迁的趋向，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历史地名移动的内在因素。

谭先生以后在辅仁、燕京、北大、浙大等高校长期从事历史地理教学和研究工作，往往要涉及许多有关地名学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他不仅从沿革地理角度来分析地名命名的渊源和演变，还结合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语言学、民族史等方面研究地名的演变。故而在许多方面发表了不少卓越的见识，在研究方法上给后学者以很多的启迪。

1959年暑期，他写了《汉书地理志选译》，虽然只选了五个郡，但其中已经包含了不少地名学研究成果。他很强调从民族分布和迁徙来研究地名的渊源。他列举了秦武公伐邽戎后，在甘肃陇西（今天水一带）置了一个上邽县，以后邽戎部族又迁至渭水流域，故而又出现了一个下邽县的例子，指出“部族迁徙所至，即以该部族名或原住地的地名作为新居的地名，这是古代常见的事，注意这些史料，对于了解古代部族的迁徙有很大的帮助”。（《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年）

汉代西南的越巂郡名，自来有三种说法：一说巂是水名，越是动词，汉越巂水置此郡，故名越巂；一水名越巂，汉兵自越巂水入定其地，因以名郡；一说越和巂都是水名，二水皆出深羌界，流经郡境故名。先生根据《汉书·高祖本纪》、《两粤传》称南方越族皆作“粤”，而越巂在《汉书·西南夷列传》里也写作“粤巂”，可见这一越字也是部族名。越巂当作越地巂水解。这是从民族分布的角度来解决地名命名问题的实例。

他也很注意地方语言与地名的关系。他曾经指出唐时贵州地区有个矩州，宋时改名贵州。可知贵字在古时南方语读作矩，今天南方某些地区仍保持着将贵字读作矩的古音。在这篇著作里又提到云南西部的邛海，在很多古籍中作邛河或邛河池。“河”是古代黄河的专称。这个“河”字则是西南民族的土语。

先生还注意到从地名字义来解决地名的方位问题。《汉志》越嶲郡瀾街县、青蛉县下有“临池瀾在北”的记载。历来对瀾街县、临池瀾的方位说法很多，没有一个说对的。先生认为以瀾字为地名的极少见，瀾街与临池瀾不应无关，应该在一县境内。志文瀾街、青蛉二县相接，当为错简。但瀾街和临池瀾又在何处？瀾街县的大致方位是知道的，在越嶲郡的东北境今四川南部雷波、屏山一带。而这一带有个龙湖，据志书记载，湖水与金沙江“同消长，日夕作潮”，正符合临池瀾的“瀾”字的字义。因而临池瀾无疑即今龙湖，而瀾街故域应在其南。这是从地名的字义上来考订地名方位的实例。

另外还从古代水运交通路线来说明地名的变迁。《汉志》济阴郡乘氏县（今山东钜野县西南）有“泗水东南至睢陵入淮”的记载。但是这条河在《禹贡》和《水经注》里都称作“洧水”或“荷水”，而汉代人为什么要称它为泗水呢？这是因为这条水道介于洧、泗二水之间，为古代重要水运航道。中原人自西徂东，东南人由东向西，由洧入泗或由泗入洧都要经过这条河道。日久有人就误称此水为泗水或洧水，而其真名荷水反而被淹没了。

仅举上述几个例子，就可见先生在研究沿革地理的同时，也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地名学的研究。

1955年开始，他主持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这部大型历史地图集中大小地名数以万计。谭其骧先生在主编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地名学上的问题，更加感到建立地名学的重要意义。1962年他在上海史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历史地名的史料意义》的报告，希望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协作来建立“中国地名学”这一学科。他认为外国已有这一学科而我国尚未建立起来。外国的地名学侧重从地名语源属于何种语系这一方面研究，为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史的研究提供资料；而我国由于汉字的一些特点，如单音，用以译复音语难以正确；又古代书写麻烦，不能全译，常省略为一二字，致使难以恢复原义；

古今读音变化很大，非汉语语言译成汉字会失去意义，使传抄转抄时易致讹夺等等原因，在这方面有一定困难。但这只是地名学的一个方面，即使这一方面也不是绝对不能搞的。我国很多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另外历史地名反映的历史地理资料和社会经济资料具有重要意义。谭先生认为历史地名所以具有史料意义，因为地名是各历史时代人取的，必然反映一定的历史属性。它所能提供的资料，至少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从地名渊源，反映该地名开始得名时的地理环境，即历史地理资料。如以取名“阴”“阳”的地名，与水道山脉方位相印证，对研究水道变迁有用；先秦时代华北大平原上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反映了当时地貌起伏不平，人们可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泛滥。这些“丘”在后来都不存在，说明因黄河或其他河流漫流，已为洪水所挟泥沙淤平。还有“斥章”、“斥丘”等地名反映了盐渍土的分布。

第二，反映取这些地名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即社会政治经济资料。如春秋地名称“氏”、“父”者甚多，说明当时还存在氏族组织残余，并且一氏居一地的情况还较普遍。两汉以“乡”、“亭”、“聚”命地名，反映了当时地方基层行政制度。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出现，应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有关。而唐中叶以后内地有“镇”、“集”、“市”等相继兴起，反映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场”、“务”等地名反映官营手工业的发达等等。

第三，有些地名反映取这些地名的人的族属和使用的语言，即民族史、人类学的资料。古代的地名往往随着部族的迁徙而迁徙，可以据此探究部族迁徙的路线。同时也可以看出氏族分布的情况。汉代就有很多县名即直接以所居族名为名。他还从“不”字是古代分布在东北滨海民族的发语音，详细论证了何以沿海一带的地名前面常带“不”字。如“不而”、“不夜”、“不其”等。从汉代北方许多带“奴”字的地名语源上，考证了匈奴与这些地区的关

系。他还详细列举了很多材料论述今江浙地方多以“句”、“於”、“姑”、“余”、“无”、“乌”等为地名，与古代吴越语的发音有关。认为吴越是同语系的一族两国。

从这个学术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谭先生在地名学方面渊博的知识和对地名学的建立抱着殷切的期望。虽然在以后的几年里，由于历史地图、辞海等工作十分繁重，没有时间用于写作这方面的专文和论著，就是那篇对地名学的发展很有价值的学术报告也没有时间整理成文，公之于世。但他对地名学的建立一直是十分关心的。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地名学的文章，他都尽可能找来阅读。平时他在与我们交谈中，对近年来地名学研究文章的逐渐增多和专门刊物《地名知识》的出现等，表示了莫大的关切。他很有心愿将自己多年来对地名学研究心得写成专文，可惜一时还抽不出时间来。目前他正在指导他的研究生写作地名概论的专著。

[转自《地名知识》1982年第2期]

谈谈中国地名的起源和演变

熊 树 梅

凡是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域，绝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名称，叫做地名。

地名是人类社会出现后才产生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地名也由少而多，由简而繁，其传播范围也由近而远，由小而大。随着国际交往的日趋频繁，地名在各国家、民族之间广泛转译。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人类活动范围已超出地球之外，月球、金星、火星和其他星体上出现了愈来愈多的新地名。

地名是人们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开始时只有音和义。文字产生后，地名便有了形，在不同语言文字之间又有了互相转写的问题。阶级社会出现以后，有些地名又被打上阶级烙印。在旧中国不仅有含大国沙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意识的地名，而且有带形形色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色彩的地名。解放后则有带大量反映社会主义时代风貌的新地名。地名中很大的一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替，民族的迁徙，经济的盛衰和地理环境的变化不断有所改变。

地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首先关系国家的领土主权。例如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也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越南在一九七四年以前的政府文件、报刊、教科书和地图中也一再确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但是一九七五年四月越南当局悍然派兵侵占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后，便在国内外大肆宣传，硬说南沙群岛是“越南的领土”，并且篡改地图，把南沙改为“长沙”。有的国家把南沙群岛改名为“卡拉延群岛”，也是

对我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又如位于我国和尼泊尔国界线上的世界第一高峰，早在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藏文古籍《红史》上就有次仁玛宾阿的记载，意为长寿女神五姐妹，把五座雪山的主峰称为“次仁玛”，全名是“久穆拉缅（后妃神女）扎西次仁玛（吉祥长寿女）”。一七一七年（清康熙五十六年）的《皇舆全览图》正式标出“朱母朗玛阿林”，朱母朗玛就是久穆拉缅，“阿林”是满语山峰之意。一七三七年、一八三六年欧洲出版的地图都采用此名。一七七一年的《乾隆内府舆图》改标为“珠穆朗玛阿林”^①。尼泊尔人则称为“萨加玛塔”，意为伸入天庭的高峰。但是五百多年后，印度测量局的华夫（A. Waugh）于一八五二年测绘该区地图时，却以“发现者”自居，擅将珠峰改名埃弗勒斯峰或写作额非尔士峰（印度测量局长名G. Everest）。这一名称直到一九五一年才得到改正。再如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从来归我国领有。苏联妄想霸占，改名为“达曼斯基岛”，曾发动了多次武装入侵。

地名关系到民族感情和民族团结。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将长期存在。历史上遗留很多反映旧意识的地名：如迪化（一九五三年复名为乌鲁木齐，维吾尔美丽的牧场，蒙语卖酸奶的人）、归绥（一九五四年复名呼和浩特，蒙语蓝色的城）、平彝（一九五六年改名富源）、安东（一九六五年改名为丹东）等，必须清理整顿。

地名对国民经济建设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一地多名、同名异地、转译传写、音义乖违，甚至有地无名、有名无地（如西藏噶大克）的现象。地名的混乱给生产、交通、邮电、国防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亟须研讨审定。

① 唐时松赞干布下令在南方雪山建寺养供百鸟，名“甲木隆”（百鸟之地），后转称“角木隆马”。见《禹贡》，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

地名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也直接关连。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新的工矿区、城镇、农业基地将大量出现,带来非常繁重的命名工作。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对地名的规范化和国际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对地名的研究由来已久。二十四史中就有十六部地理志,从某种意义讲就是全国的地名志。唐代的《元和郡县志》、清代的《嘉庆一统志》、《西域同文志》等都是有关地名的专著。至于全国各地卷帙浩繁的各种地方志,对各地的设置兴废、历史发展和地理变迁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为研究地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地名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则是近代的事。在欧洲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有地名学的专著发表,有些区域地理著作对地名系统有专章研究。日本的古典地名研究起源也很早,明治维新以后受欧洲的影响,先后从历史地理学、民俗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等方面发展到综合研究地名系谱、地名群落和地名的发生发展等问题。

我国三十年代出版的八十二期《禹贡半月刊》对先秦列国、秦代郡县、两汉侯国、东晋侨置州县、十六国都邑、镇、唐道、宋路、元省、明都司卫所以及明清土司等均有论述,对某些地方行政区域建置沿革,长城、运河的兴废变迁和有关民族、边疆问题也有论述,并有关于地名学的研究专文。

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涵义,分布和演变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是与历史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密切关连的综合性、边缘性学科。而地理学的研究、地理知识的普及、地图的编绘都是离不开地名的,故地名研究是地理工作者重要任务之一。

一、地名的起源

地名的起源和含义是十分复杂的,大体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因

素和社会历史因素两大类。属于自然环境因素的主要有：

1. 地理方位

我国文化主要发源于黄河中下游。河南自古有中原之称，又名中州或中土，因此产生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华东、华北、华南等地名。在省、县以下直到村镇，也多有以省会、县治、村落为中心用方位命名的地名。如湖南以长沙为中心有湘东、湘西、湘南、湘北之称，许多县、镇、村落都有按当地东、南、西、北方位命名的山、河、湖、沼和其他地物。东洋、南洋、西洋则是以中国居天下之中引出来的方位地名。春秋时候还出现了用天文方位星座位置和地面一定区域相对应的“分野”说，以周、秦、楚、齐、赵、燕、晋、宋、卫、鲁、郑、吴越按十二次作了分野，秦汉以后又代以郡国。不少古地名保留在星图上，如汉水对应银河，长沙、黄姑村（在江苏昆山）均和星名有关。

2. 地理位置

城镇聚落大部分依山傍水、临海滨湖。很多地名起源于这些地物的相对位置。山地是地表较大高度和坡度的隆起地貌，常常是地名的重要标志。《尔雅》所载山大而高曰崧（嵩），山小而高曰岭，锐而高曰峤，小而众曰巘，山夹水为涧，山有穴为岫，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小陵曰丘等在地名上都有反映。通常山东称左，山西称右，山南称前，又称阳，如衡阳，位于湖南衡山之南；山北称后，又称阴，如华阴，位于陕西华山之北。

河流是沿地表线形低凹部分集中的水流，也称江或水。较小的叫溪，季节性缺水的称沟。由于具备水源和交通的优越条件，其两岸常常发展成为城镇。《尔雅》所载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在地名中均有表现。河流的上源通常指边界附近的山地，地名用“源”，如凌源（辽宁，大凌河源

地)、泾源(宁夏,泾河源地)。河流的下游注入湖泊或海洋的出口常用“门”或“口”,如海门(江苏,长江入海处)、湖口(江西鄱阳湖与长江会合处)。靠近河流、湖泊、海洋,地名常用临、浦、皋、渚、滨、澳、湖、海、河等字样,如临夏(甘肃大夏河西岸)、江浦(江苏长江西岸)、岚皋(陕西岚河西岸)、良渚(浙江钱塘江北岸)、滨县(山东渤海沿岸)、海宴(青海湖东畔)、镇海(浙江东海沿岸)、澳门(广东珠江口,海湾可以泊船的地方叫澳)。河流的会合处称口、合,或用数字,如合江(四川赤水河入长江处)、汉口(湖北汉水入长江处)、三河(内蒙古根河、得尔布尔河、哈乌尔河汇流处)、三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入黑龙江处)、五水(湖北东部倒水、举水、巴水、浠水、蕲水的总称,晋时均在西阳郡)、五河(安徽,以淮、淝、浍、沱、潼五河合流得名)。河流转弯处称曲或厓,如曲江(广东,武水、浈水合流绕城曲折)、盩厓(陕西渭水南岸,太白山北,山曲曰盩,水曲曰厓,现改名周至)。通常河东称左,河西称右,河南称阴,如江阴,位于江苏长江南岸;河北称阳,如沈阳,位于辽宁浑河支流小沈水北岸。咸阳位于陕西渭河北岸,又在九峻山南麓,南阳在南山之南,汉水之北,均因而得名。

3. 地理事物的特点

我国有很多地名是由地理事物加形容词构成的,如黄河、赤水、浊水溪(台湾)、马鞍山、鲑鱼湾(大连新港)、葫芦岛、月牙泉(敦煌)等。有的直接转化为各级地域名称,如青海省、三门峡市、洪湖县等,县以下地名更为常见。反映自然资源和特产的地名也较多,如铁岭、铜陵、铅山、无锡(周秦时产锡,汉顺帝时锡竭改今名)、金瓜石(台湾)、锡矿山(湖南,产锡)、大理等。有些地名如大冶、古冶(河北滦县)均产铁,焦作、磁窑(山东宁阳)均产煤,能间接反映当地资源。至于蛇岛

(辽宁)、鸟岛(青海)、蝴蝶泉(云南)、攀枝花(四川)等则是当地特点在地名上的直接反映。

4. 区域特征

我国疆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很多地名具有区域性地理特点:如恒春(台湾)、温州反映了当地气候特点。但更多的是反映地貌特色。在华北黄土地区,平坦的高原称“原”,如董志原、白草原(甘肃会宁);长条状的丘陵称“梁”,如大营梁、东道梁(甘肃定西);孤立圆穹状丘陵称“峁”(甘肃称咀),如哈家咀(兰州)、安家咀(临洮);谷坡两侧局部平地称“坪”,如佛坪(陕西)、桦林坪(兰州);河流宽广的阶地称“川”,如洛川、泾川;河谷两侧的低平地能为洪水浸漫的称“滩”,如雁滩、马滩(兰州)。西南地区岩溶地貌发育,溶蚀洼地、落水洞、干谷、盲谷、漏斗、溶洞等分布很广,故在各地名中常出现塘、坝、沱、井、洞、场等字样。

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蒙古族在历史上以游牧业为主要经济活动,反映在地名上对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都区分得细致而精确。同是河流(乌苏),水量丰富的叫木伦,经常干涸的叫果勒。同是沙丘(满哈),流动的叫茶干满哈,半固定的叫波鲁满哈。同是平地,沙磧平原叫夏拉,水草平原叫塔拉,高平原叫锡林,盐碱地叫柴达木。同是山地(乌拉),高山叫温都尔,小丘叫鄂博,山峰叫哈达,山口叫达坂。草原叫鄂尔多斯,湖泊叫淖尔,盐池叫达布苏等。在这类地理通名上加上方位、数字或其他形容词如颜色、美丑、大小、多少、冷暖、干湿等,构成乌满哈达(南峰)、昭乌达(百棵柳树)、可可稀立山(绿色山丘)、白云鄂博(富饶的丘陵)、伊胡塔拉(大水草地)、土默特川(万人川)、灰腾梁(冷山)等,增加了蒙语地名的丰富性和规律性。

青藏地区藏族聚居区的地名除和蒙族有相似的特点外,由于地处高寒,常出现冰、雪、冷、荒等字样,如日喀则(高地的村镇)、